

文学研究与争鸣

试论两汉时期围绕屈原及《离骚》 产生的序体文学作品

崔瑞萍

【摘要】两汉时期围绕屈原及《离骚》形成了激烈论争,并产生了大量以“序”作为论争战场的作品。通过对论争背景及“序”以立意为宗、散体行文之文体特征的具体分析,可以发现论争实质是知识分子对自身是否应认同屈原这样过于高洁、过于偏激的知识分子的理想人格的不同反应,对论争双方的具体作品也有在此基础上重新审视的必要。

【关键词】屈原 《离骚》 士 序作

【中图分类号】I206.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2952(2009)01-0072-05

正如研究者普遍注意到的,两汉时期围绕《离骚》展开过一场激烈论战,效骚、反骚作品层出不穷。如果说这些作品还是间接表明作者态度的话,那么,论战直接交锋的主战场,作家们选择的是序。在面对序作文本之前,探究两汉文人为何选择《离骚》这一主题,又为何在众多文体之中独独选择序作为战场,是一个很有意义的命题。

西汉时期的察举制重德行经术,亦重吏治。《汉官仪》载,当时取士有四项标准:“一曰德行高妙,志节清白;二曰学通行修,经中博士;三曰明达法令,足以决疑,能案章覆问,文中御史;四曰刚毅多略,遭事不惑,明足以决,才任三辅令。皆有孝悌、廉公之行。”^①但纵观历史,从秦王朝专制统治开始之后,几乎每一时代最出色的才子文人,都着重选择那些能够畅快淋漓地抒写情感的文体,绝不肯把主要精力都花在皓首穷经经营仕途上。其原因正如徐复观所说,它体现的是知识分子面对政治专制的压力时的抗争性反应。^②所以,即便在非常注重经学研究的汉代,一流的文学家也大都没有

将主要精力用在修德治经上,而是不约而同选择了楚辞创作。不过不同于它类文学作品研究的是,在古往今来的《楚辞》研究中出现了一个令人惊讶的文化现象,即以儒家文化的价值标准评价屈原和《楚辞》。无论“犹依道径,以风谏君”或“增夫三纲五典之重”,总与儒家思想的价值观念相联系。众所周知,《楚辞》是以楚国诗人屈原为代表的作品,虽是南北文化交融的结果,却并非在学术上属于哪家哪派,甚

① (汉)应劭:《汉官仪》卷上,《丛书集成新编》第30册,(台湾)新文丰出版公司民国75年版,第248页。

② 徐复观:《西汉知识分子对专制政治的压力感》曰:“每一个知识分子,在对文化的某一方面希望有所成就,对政治社会希望取得发言权而有所贡献时,首先常会感受到自身的志趣与所生存的时代,尤其是与时代中最大力量的政治,乃处于一种摩擦状态;而这种摩擦状态,对知识分子的精神,常感受其为难于忍受的压力。并且由对这种压力感受性的深浅,而可以看出一个知识分子自己的精神、人格成长的高低,并决定他在文化思想上真诚努力的程度。由各个人的秉赋、生活环境、及学问上的机缘,各有不同,对这种‘压力感’的反应也各有不同,因而形成文化上不同的努力方向。”见《两汉思想史》第1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166页。

至还有浓郁的方域文化特征，而研究中却出现了儒家思想为主导的文化阐释。而《离骚》一篇，如姜亮夫所总结的：“……暴露时代之黑暗，如何酣透！反抗秽恶之精神，又何等率真！此其为古今第一等作品，悬诸日月而不刊也。”^①因为作者的独特经历、主题抒写怀才不遇、情感上表现出强烈爱国情怀，更引起了大量意有郁结之文人的通感。但是这种同情和通感，却恰恰会引起另一些秉承传统宣扬愚忠愚孝、君君臣臣观念文人的不满。袁济喜对此描述为：“汉代辞赋文学的发达，同它对《楚辞》文学传统的继承有关。汉代效《骚》之作层出不穷。……在继承《楚辞》文学传统的同时，两汉的人物，围绕屈原的为人及《离骚》，展开过一场论战。”^②

围绕《离骚》产生的论战，鲁迅评论道：“《离骚》之出，其沾溉文林，既极广远，评鹭之语，遂亦纷繁，扬之者谓可与日月争光，抑之者且不许与狂狷比迹。”^③论战的实质是，知识分子对于自身是否应该认同屈原这样过于高洁、偏激的知识分子的理想人格的不同反应。说到底，是“士”作为一个成熟个体在进入人生和事业的高峰，面对从传统儒家教育的理想人格境界进入以非正常为正常、而你还不得不接受的真实世界的挑战时，发现自身为了生存必须违背被灌输已久的道德规范，必须将过往持有的是非曲直了然分明的观念转变为默然接受时，对人生究竟有无继续存活的意义、是要抗战还是服从命运、究竟该保持何种程度的道德底线的思考。徐复观说：“《离骚》在汉代文学中所以能发生巨大的影响，一方面固然是因为出身于丰沛的政治集团，特别喜欢‘楚声’，而不断加以提倡。另一方面的更大原因，乃是当时的知识分子，以屈原的‘信而见疑，忠而被谤，能无怨乎’的‘怨’，象征着他们自身的‘怨’；以屈原的‘怀石遂自投汨罗以死’的悲剧命运，象征着他们自身的命运。”^④人生理想不能得到实现、人格不能继续保持高尚、人生态度不能容于当世，思考人生命运已然没有意义，“当人遇到严酷的悲剧事实时，他就要面对无情的限制。在这一限制之下，他找不

到全面拯救的保证。毋宁说，只有至死不渝地表现出自己的人格并认识自我，他才能得到救赎与解脱。”^⑤高洁的知识分子能选择的道路只有像屈原一样赴水自沉。但理想的破灭是知识分子共同认识到的事实，而真正能选择保存尊严、从容赴死之人生态度的，古往今来却罕有其人。雅斯贝尔斯说：“初看起来，以任何代价求取生存的意志似乎表明了生命力的顽强坚韧。但是，它也可以被看成是不经任何怀疑和问询就顺从于坚持自己被指定的、成为习惯存在的身份的标记。相反，逃避生命最初看来可能像是胆小害怕，但是只要人被迫过着毫无尊严的生活，除了死亡的恐惧之外没有什么可以使人眷恋生活，那么追求死亡就可能是无畏无惧的。”^⑥不敢于追求死亡的理想人格失落之余，要继续生活的知识分子自然就必须为继续生存寻求理由。因此，这场论战的主要争执，不是理想破灭的知识分子是否应死节的问题，而是缺乏追求挣脱生存桎梏的文人，为继续生存到底要寻找什么样借口的分歧。这种分歧表现在立论的根本立足点之不同，即：是秉持同情屈原但以其行为非，或从根本上否定屈原的人格和行为。

论战的主要人物中，序作流传的有贾谊、扬雄、刘安、班固、王逸等。^⑦《离骚》这一主题的选择，反映了知识分子对人生的态度和价值取向。正如徐复观所认为的，一方面，它与汉代统治者出生楚地、爱好并都积极创作楚辞楚歌有关，正所谓上有所好下有所效；另一方面，也是知识分子的人生象征。还有徐文中未

① 姜亮夫校注《屈原赋校注》，人民文学出版社1957年版，第139页。

② 袁济喜：《两汉文学批评与心理体验》，《文学评论》2007年第2期。

③ 鲁迅：《汉文学史纲要》，人民文学出版社1973年版，第22页。

④ 徐复观：《西汉知识分子对专制政治的压力感》，见《两汉思想史》第1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168页。

⑤⑥ [德]卡尔·雅斯贝尔斯：《悲剧的超越》，亦春译，光子校，工人出版社1988年版，第27、78页。

⑦ 王逸后叙称：“孝章时班固贾逵复以所见改易前疑，各作《离骚经章句》。”惜贾逵文今已不传。

谈到的原因，即文学家出于自身抒情写意的创作心理需求和当时文人集团内自由的艺术环境，兼之楚辞特有的文体特色，使楚辞创作成为文学家的首选。但是，楚辞并不能涵盖文人创作的全部需求，他们还要求更无拘无束表达自己对命运困顿的不满和感慨。而因对象、情境等不同，作者为了达到更好的沟通目的，就会自觉不自觉地选择有利于准确传达具体题旨的言语方式。序体原以立意为宗，不以能文为本，为求写作便利起见，多用散体以资发挥。汉代文人把施展才华的重点放在楚辞中，却把对待人生的最真切的态度和观点放在了序作中。通过序，个性张扬的文人和传统保守的知识分子才完成了这场历时甚久的论战。这是文人们在创作了大量的效骚、反骚之作后，还要另外创作序的主要原因。

最早在作品中对屈原进行评论的是贾谊。贾谊赋《汉志》著录为七篇，仅《吊屈原赋》有序。由于遭遇相似，贾谊表现出与屈原类似的愤世嫉俗的强烈情感，其原因如马积高言：“贾谊所处的历史条件同屈原已不相同，他从全中国的角度来看历史，自然觉得屈原那样‘眷顾楚国’是难以理解的，同时也寄托着自己那种希望倔强地生活下去的意志。”^①就灵魂深层次而言，这是再不肯为人格自由选择结束生命、对待悲剧的意识已经萎缩为美学超然的表现：“作为一个旁观者，我也同样有所感触，我从我自以为高尚的情感中得到自我满足。我有所偏袒，我作出评价，我让自己受到震动——而实际上，我正躲在遥远的安全地带。”^②

贾谊之后有扬雄《反离骚序》。《反离骚》在历史上一贯受人非议，惟李贽曰：“《反骚》，反其辞，以甚忧也，正为屈子翻愁结耳。彼以世不足愤，其愤世也益甚；以俗不足嫉，其嫉俗也愈深。”^③指出扬雄之作乃是一种更加愤世嫉俗的流露，诚为知音之谈。杨雄序文曰：

……悲其文，读之未尝不流涕也。以为君子得时则大行，不得时则龙蛇，遇不遇命也，何必湛身哉！

与贾谊的论调一致而更简捷明了。他们都不是要人们真的去“雨云反覆随流辈”，而是强调宁肯独隐也不将命运寄托在君王身上：“社会上既有了使人不满意的事实，而又不愿意同流合污，……于是这些洁身自好的逃避者，为了辩护自己行为是最清高而又最适当的办法，便慢慢地把这种行为来加以理论化了。”^④这从一个侧面可以理解为汉以来独立人格张扬的表现。

淮南王刘安《离骚传》作为第一部研究楚辞的专著，开启了楚辞学的先河，其序文的地位也自不必言。《离骚传》与《叙》其文今已不传，只能在前人的著作中窥其梗概。据汤炳正考证，今本《史记·屈原列传》中窜入的两段文字：

《离骚》者，犹离忧也。……推此志也，虽与日月争光可也。^⑤

虽放流，睠顾楚国，系心怀王，不忘欲反，冀幸君之一悟，俗之一改也。……易曰：“井泄不食，王明，并受其福。”王之不明，岂足福哉！^⑥

乃刘安《离骚传》的总叙内容。又据班固的《离骚序》评论《离骚传》说：“五子以失家巷，谓伍子胥也，及至羿、浇、少康、二姚、有娥佚女，皆各以所识有所损益”，知《离骚传》不止《屈原列传》中窜入的两段，还有注文。^⑦所以颜师古《汉书》注说《离骚传》犹如《毛诗传》之类。虽然《离骚传叙》及《离骚传》已难以确见，我们也无法探究二者之间的关系，但研究者普遍认为，刘安对屈原的评

① 马积高：《赋史》，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第59页。

② [德]卡尔·雅斯贝尔斯：《悲剧的超越》，亦春译，光子校，工人出版社1988年版，第92页。

③ (明)李贽：《读史·反骚》，《焚书》卷5，中华书局1975年版，第197~198页。

④ 王瑶：《论希企隐逸之风》，《中古文学史论》，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189页。

⑤⑥ (汉)司马迁撰，(宋)裴骃集解，(唐)司马贞索隐，(唐)张守节：《史记正义》，《史记》卷84，中华书局1982年版，第2482、2485页。

⑦ 汤炳正：《屈赋新探》，齐鲁书社1984年版，第2页。

价体现了就当时而言比较先进、民主的思想和艺术观，刘安是第一个理解屈原并给予极高评价的人。

《离骚传叙》是刘安入朝时奉皇帝诏而作的，表现出强烈的尊儒倾向。汉武帝即位以来实施了一系列的尊儒、重儒的政治举措。作为政治家，刘安自然会揣摩在他献上以黄老杂家思想为主的《淮南内篇》以后，武帝要他作《离骚传》的意图。刘安之父刘长“自为法令，拟于太子”，最后走上了反叛的道路。刘安比其父高明之处不过是谋反的准备时间更长，组织更隐秘罢了。他一面和武安侯田蚡密商接继武帝之嗣，另一面却“献《颂德》及《长安都国颂》”，极尽歌功颂德之能事以讨好武帝。此时受诏作《离骚传》，刘安不可能违背汉武帝意旨。而在入朝期间，君臣“每宴见，谈说得失及方技赋颂，昏莫然后罢”的协调关系，也会给刘安带来相应的心境。因此，竭力迎合汉武帝尊儒的思想倾向是刘安的必然选择，也明确反映在其序作中。

《离骚传叙》开启了以骚附经的传统，评论《离骚》的思想内容时，讽谕“怀王以不知忠臣之分，故内惑于郑袖，外欺于张仪，疏屈平而信上官大夫、令尹子兰。兵挫地削，亡其六郡，身客死于秦，为天下笑，此不知人之祸也”，引用《易经》井卦“九三”的内容：“井泄不食，为我心恻，可以汲。王明，并受其福”，^①都是以儒家经典作价值评判，总结历史经验。刘安把《离骚》与《诗经》相提并论，给予《离骚》前所未有的高度评价。愚见以为，正是《离骚传叙》对屈原及其作品的批评开始引起文学家关注和论争，使以骚附经的思路形成深远的影响，并最终奠定了屈原和《离骚》的历史评价。其最重要的后果是使中国古代文学批评在散见各处、只言片语式的习惯之外，终于在一种文体中开始有相对完整的存在形式并逐步形成理论。这一文学批评阵地的出现和文学家开始接受并选择序作为批评的主要文体，对中国古代文学批评而言意义是重大的。

以上都是一些不很得志的文人的牢骚，对另一类安时顺命的文人而言，屈原并非值得效

仿的良臣，班固即代表人物。班固虽在《离骚赞序》中对屈原给予了极高的评价，但以笔者看，这大约是囿于“赞”之文体只表示出颂扬之情，并未表达作者的真实想法。在《离骚序》中，他明确反对刘安的观点，认为屈原的行为不符合传统君子的安时顺命之道。在序中，他认为作为社会精英的知识分子在遇到理想不能实现的挫折时，抗争无异于螳臂挡车，孟子所谓“穷不失义，达不离道”才是君子洞明世事后的通达之举。班固认为屈原的极端行为不符合孟子教诲，他所树立的狂狷典范，是对法度维持的社会一种破坏。

王逸在西汉刘向编辑 16 卷本《楚辞》的基础上，又加入《九思》一卷并作注成《楚辞章句》。王逸于此书中解说屈原身世，发明屈骚意义，训释楚语方物，后人但谈楚辞必不能舍其书而他就。值得注意的是，王逸《离骚章句叙》在贾谊、刘安等颂扬屈原、班固否定屈原之后，重新对屈原及《离骚》进行了肯定的评价，从此奠定了对屈原的总的历史性评价，使刘安对屈原的分析评价在历代倍受推崇。班王之论争依旧围绕屈原是否忠臣、屈原之死是否有价值和其作品之牢骚是否值得颂扬的问题上。^②序文开篇即道：

……且人臣之义，以忠正为高，以伏节为贤。故有危言以存国，杀身以成仁。是以伍子胥不恨于浮江，比干不悔于剖心，然後忠立而行成，荣显而名著。若夫怀道以迷国，详愚而不言，颠则不能扶，危则不能安，婉婉以顺上，逡巡以避患，虽保黄耆，终寿百年，盖志士之所耻，愚夫之所贱也。今若屈原，膺忠贞之质，体清洁之性，直若

^① 高亨：《周易古经今注》直接引用《史记·屈原列传》评《骚》，“人君无愚智贤不肖”至“岂足福哉”一段（该段正是司马迁引用刘安之文），印证井卦“九三”的思想意旨，并强调其“得其旨矣”，肯定了《离骚传》的引用与《易经》井卦“九三”的精神实质的一致。

^② 蒋方以为，班固王逸论争的焦点在于班固以屈原为贤臣而王逸以屈原为忠臣，参见蒋方《王逸与班固的屈原评价之争》，《古典文学知识》2006年第3期。

砥矢，言若丹青，进不隐其谋，退不顾其命，此诚绝世之行，俊彦之英也。而班固谓之露才扬己，竟于群小之中；怨恨怀王，讥刺椒兰，苟欲求进，强非其人；不见容纳，忿恚自沈，是亏其高明，而损其清洁者也。昔伯夷、叔齐让国守分，不食周粟，遂饿而死，岂可复谓有求于世而怨望哉！

这段论述大义凛然，掷地有声，将千古以来文人们积压在心头的愤懑不平，对人生和命运的抗争，对个人保持人格高尚而并不在乎是否曲高和寡的心思表达得淋漓尽致。时代虽然变迁，但是这种难以向世人言诉的追求高尚人格、却不被众人理解的孤独是永远相同的。一代代的时光流转，诗人们仰望月空，每一颗星仿佛都是屈原、也是自己的影子——在拥挤的星河中，是那么的孤独。而作者并未停留于此，而能以学术史的眼光来审视屈原及《离骚》的地位和价值，将贾谊、司马迁以来反复悲吟的“士不遇”之命运感伤转变为忠君眷国的道德表彰，从而也弱化了屈原的怨君疾世之情，并最终使得士不遇的主题感伤和忠君眷国的志节颂扬成为屈原接受史上的两大最主要的命题。这种转变的实际意义在于，它实质上是寻求到了一条可供知识分子在人格自由与专制权力的冲突中取得自我舒解的途径，并自此被后世文人广泛接受。

屈原及其《离骚》被后代学者、文学家反复争论，其实是各个时期的历史情景中关于“士”的重新解读。在解读的过程中，屈原及《离骚》已经成为思想的象征而承担起现实的责任，个体正是借助这样一个支点，以回溯历史的方式进行文化认同或文化省察。这个独特的文学现象也正是葛兆光在研究思想史时所探究过的“固有的思想资源不断地被历史记忆唤起，并在新的生活环境中被重新诠释，以及在重新诠释时的再度重构”。

[导师徐公持教授点评]

崔瑞萍同学新撰《试论两汉时期围绕屈原及〈离骚〉产生的序体文学作品》一文，通过对屈、骚传承过程的系统分析，指出当时的楚辞作者和学者们，为抒发士阶层对人生出处等重大问题的独立思考，而选取“序”这一相对自由文体的内在原因。

文章视角新颖，论证周密，体现出创新精神。

本文作者：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文学系2008届毕业文学博士

责任编辑：马光

On Works of Preface Connected with Qu Yuan and Li Sao in Xi Han and Dong Han Dynasties

Cui Rui ping

Abstract: In both Xi Han and Dong Han Dynasties, there was a heated debate around Qu Yuan and his work *Li Sao*. Almost all the excellent writers participated in the debate and as a result, a great many prefaces were created. By analyzing the background of the debate and the stylistic characteristics of “preface”, which is described as the original case and loose wording, this article reveals the essence of the intellectual debate, that is, the different reactions of intellectuals toward whether to agree with the excessively noble and radical ideal personality of Qu Yuan, and draws a conclusion that it is necessary to re-evaluate the works of both sides in the debate.

Key words: Qu Yuan; *Li Sao*; intellectuals; preface